



杜威教育丛书 单中惠◎主编

杜威学校

「美」

凯瑟琳·坎普·梅休等著
王承绪 赵祥麟 赵端瑛 顾岳中译



Renewal of Life by Transmission.
The most notable distinction
between living
and inanimate
things is that the
former maintain
themselves by
renewal. A stone when struck
resists. If its resistance is greater
than the force of the blow struck, it
remains outwardly unchanged.



教育科学出版社

杜威教育丛书

丛书主编：单中惠

杜威 学校

DUWEI
XUEXIAO

[美]凯瑟琳·坎普·梅休 等著
王承绪 赵祥麟 译
赵瑞瑛 顾岳中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樊慧英

责任校对 刘永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威学校/ (美) 梅休等著; 王承绪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1

(杜威教育丛书/单中惠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3657 - 2

I. 杜... II. ①梅... ②王... III. 教育学 - 研究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729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49
邮 编	100101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传 真	010 - 6489179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336 千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80 元	印 数	1 - 7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在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认真思索了社会对学校的挑战和需求，既批判了传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又主持了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的教育实验。在他自己漫长的教育生涯中，杜威始终没有停止对“现代教育”的探索，撰写了大量教育著作和论文，不仅对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奠定了他作为西方教育大师的地位。1991年，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了《杜威著作全集》（37卷）。

人们普遍承认，杜威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因为他确实给教育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在教育领域中引起了重要的变化。尽管杜威经常被人误解，在50年代还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但是，人们在60年代以后重新表现出对他的教育思想的热情，更深入和更理性地反思杜威对“现代教育”的探索。正如美国学者洛克菲勒（S. C. Rockefeller）所指出的：“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杜威正处于他的生涯的顶峰……然而到50年代，对他的著作的早期的广泛的兴趣却在衰退。但是，一种对杜威的更广泛的学术理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里，人们重新意识到经典的美国哲学传统的价值，包括对杜威的学术成就的肯定。”^①

^① S. C. Rockefeller, John Dewey Religion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1, Preface.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也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使他成为当时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西方教育家。在1949年后的近30年里，杜威研究几乎沉寂。但是，从1979年起，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教育思想上，中国学者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读杜威，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无论对西方教育界还是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都是一个基本课题。美国教育学者罗恩（R. J. Roth）曾这样指出：“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像，他在前进中怎么能够通过杜威。”^①我国教育史学者赵祥麟先生也曾指出：“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将依旧保持生命力，并继续起作用。”^②因此，杜威教育丛书的出版正是基于我国教育界重读杜威的需要。

杜威教育丛书包括了《杜威教育名篇》《杜威学校》《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杜威教育名篇》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赵祥麟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王承绪编译。该书包括了杜威从1897年到1952年的24本（篇）主要论著，其中既有《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明日之学校》《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等一些重要著作，又有《我的教育信条》《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芝加哥实验的理论》《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等一些重要文章。从《杜威教育名篇》中，读者可以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

《杜威学校》一书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王承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赵祥麟、上海师范大学教科院顾岳中、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赵端瑛翻译。该书是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凯瑟琳·坎普·梅休

① R. J. Roth, John Dewey and Self-Realization, Prentice-Hall, Inc., New York, 1962, Preface.

② 赵祥麟：《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Katherine Camp Mayhew) 和安娜·坎普·爱德华兹 (Anna Camp Edwards) 这两位教师于 1936 年撰写出版的, 其中详细地叙述了杜威学校作为一所实验学校的起源、办学目的以及方法, 为读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杜威的教育实验。杜威本人曾认为, 梅休和爱德华兹的《杜威学校》对这所实验学校的工作作了全面而有权威性的论述^①。后来他写成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和《我们怎样思维》等著作正是杜威学校教育实验的直接成果。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一书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单中惠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王凤玉汇编。该书按教育哲学、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现代教育、伦理教育、学生自治和教师职责等 10 个方面汇编了杜威从 1919 年 5 月到 1921 年 8 月在中国的 61 篇教育讲演。为方便读者对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的阅读和理解, 在每一部分前还提供了一篇简要的导读。从《杜威在华教育讲演》中, 读者可以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在中国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

杜威教育丛书即将付梓。在此之际, 应该感谢《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张圣华主任, 正是在他的激励和支持下, 杜威教育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希望杜威教育丛书的出版能为我国教育界重读杜威以及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杜威教育丛书主编 单中惠

^① 参见简·杜威著, 单中惠编译:《杜威传》,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2 页。

译者前言

《杜威学校》一书的副题叫《芝加哥实验学校》，由凯瑟琳·坎普·梅休、安娜·坎普·爱德华兹著，1936年出版，1966年再版。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正式名称叫“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后来，“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附属于芝加哥大学，大家称“杜威学校”和“实验学校”。芝加哥实验学校共办了8年（1896—1904）。《杜威学校》的作者是当时实验学校的教师，她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对实验学校的设计、理论和实验情况，作了最详尽的记述和阐明。

芝加哥实验学校是杜威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实验园。1894年杜威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1896年创设了芝加哥实验学校。他一直强调，这所学校原意是一所实验学校，它从来不是“模范学校”，也不是“实习学校”。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在于“检验用作工作假设的某些来自哲学和心理学的思想”，实际上杜威关于实验学校的设计和理论是他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应用。

实验学校于1896年1月开学，学生共16人。同年10月，学生增至32人，1897年12月增至60人，到1903年学生最多时为140人。开办时正式教师3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教师也不断增加，到1904年，教职员达23人，助教（大学研究生）10人。实验学校于第三年年终，把所有教师分别组织到幼儿园、历史、自然

科学和数学、艺术、音乐、语言、家事科学、手工艺和体育等研究室。研究室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经验的教师领导，并要求教师在各自领域里机智地研究课堂中进行各种活动时发现的问题。由于实验的任务，学生分为各个小组，不分班级。芝加哥大学许多研究人员和教育系大部分师生也共同参与这个实验。

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整个实验进程，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97—1898）是摸索时期；第二个时期（1899—1903）是第一时期证明有效的课程、教材和方法的继续，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提高。

芝加哥实验学校开办前（1895），杜威拟了一个《组织计划》，规定实验学校必须根据实验，编写出一整套的课程、教材和相应的教学方法。根据这个要求，实验学校的编制按照儿童发展情况，分为下列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按儿童年龄分为若干小组。第一阶段4~8岁，第二阶段9~12岁，第三阶段（中等教育）13~15岁。以上各个阶段，不是截然划分，而是逐步地过渡。在第一阶段，学校生活与家庭邻里间的生活密切联系。例如自然研究、手工训练和缝纫，被看做是与儿童的校外生活相联系的活动。第二阶段重点是获得读、写、操作、算的能力，不是为了这些能力的本身，而是为了获得规律性的知识和掌握使用工具的技巧。第三阶段即中等教育的开始，在儿童掌握每门学科所使用的工具的范围，一门一门地进行学习，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专门化的活动。实验学校的课程就是由相互联系的种种活动的计划组成的。

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的8年是他的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杜威提出关于实验学校的组织计划以及各种具体措施。此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包括《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902）、《儿童与课程》（1903—1904）等，其中影响极广泛的《学校与社会》是他对实验学校的学生家长和赞助人的几个讲话汇集而成的。

为了探索教育事业的新道路，在西方，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按

照自己的构想，创办各种形式的实验学校，芝加哥实验学校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所。杜威的门徒 S. 胡克认为芝加哥实验学校是“美国整个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大胆的实验”。引人注意的是，杜威自己认为，他用的新方法远远不是完善的。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杜威是进步教育的提倡者和推动者，可是到了 30 年代，当许多进步教育家自以为追随杜威的教育理论进行教育工作而达到一个高潮时，杜威却对这个运动提出了种种批评。杜威反复强调教育过程的复杂性。他反对把进步教育的观念和原则改变为一种现成条规和固定不变的东西，像抹芥末酱一样，应用到教育问题上去。事实是，如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出一种新型的教材，可是杜威在 30 年代对这个实验进行回顾时，他承认，“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而且永远不能彻底解决”。杜威在教材问题上经过长期的实验而所得出的结论却如此软弱、模糊，以致在实践上不能起指导的作用，这是值得深思的。

从历史上看，19 世纪末，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断革新，农村和城市的生活起了深刻的变化，垄断资本高度集中，阶级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加深。同时，在教育领域里，学校制度、教材和教学方法仍沿袭欧洲旧传统，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杜威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来到芝加哥，建立起实验学校的。杜威自称相信“改善主义”（meliorism），“进步是一点一滴的，是零售而不是批发”。他确实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化和动荡，并力图通过学校教育，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在芝加哥实验学校《组织计划》里，他开头就提出“一切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协调心理（个人）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种协调要求儿童能够表现自己，但必须按照实现社会的目的表现自己”。为了做到上述这一点，他要求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作业”是它的活动的核心，通过各种作业，学校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真正的社会生活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它的目的在于

“培养个人与别人共同生活和协作共事的能力”，在于“把儿童看做社会的一员，使他能够理智地认识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并尽他的一份力量，以维护这些关系”。在《杜威学校》这本书的《杜威学校与进步学校的关系》一节中也说，“这个学校设想它本身是培养新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要使培养出的人“相信进化而不相信革命”。很显然，杜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及其整个教育理论是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为维护这个社会秩序服务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正如中外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他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过分强调直接体验社会生活，轻视理论和间接经验——书本知识的学习，导致了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教育的落后，这些都是错误的；但他反对教育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反对以书本为中心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等，还有其合理的地方，应当批判地加以吸取，可供我们借鉴。

在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芝加哥实验学校实验过程中丰富多样的原始素材和记录。杜威在 1919 年 5 月正当中国五四运动兴起的时候，由胡适邀请来华讲学，他曾到中国 11 个省市进行了 2 年的讲学活动，直到 1921 年才回国，他的著作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杜威学校》这本书过去在中国还没有翻译出版过；此次出版，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和评析杜威教育思想尤其是杜威教育实验提供重要的资料。

因限于水平，本书在译文上恐有不少缺点，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91 年 2 月

2006 年 7 月修改

引言

本书有关实验学校的叙述，对实验学校的起源、办学目的和方法讲得非常详细，无需我再费一词。但是，对本书有关实验学校的理论和实践的报道的明智审慎，表达我感谢之情，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由于本书两位作者和实验学校的长期联系，她们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她们分担了实验学校的领导工作，使她们对实验学校的基本思想、它的发展以及实施情况，能作出权威性的论述。实验学校的整个历史标志着家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寻常的合作。特别令人感到愉快的是有这么一个生动的证据，能表明合作的精神还在继续。

我的感激之情远远不只是个人的感受。本书具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是关于美国实验和进步学校中较早的一所学校的一个记录。但是，这种历史的意义并不就是一切。这个教育运动仍在不断前进，而且远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它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还很多。我认为，本书在此时此地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它的重要性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切合时势的。它对当前的意义有一点特别可以提出来。今天，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常紧迫和尖锐，也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严重。成全这两方面的价值而不牺牲任何一方，这个问题将是未来很多年代文化上突出的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学校有它们的责任，它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创造一个使这两种价值都得以保存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的形式。本书报道的这所

学校为这样一种愿望所激励，即希望发现一个学校在行政管理、教材选择，以及学习、教学和训练的方法方面，能够在发展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和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同时，又成为一个合作的社会。我确信，本书的当前的价值不尽在于它对学校生活这一方面的记述，但是，本书的现实意义使我敢于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刻，出版本书是特别及时的。

杜 威
(王承绪 译)

原 序

全世界进步学校的不断发展，表明家长和教育家们，为了他们的孩子，对一个教育经验所感到的广泛的和迅速增长的兴趣，他们在比较传统形式的学校中是找不到这样的教育经验的。这种兴趣，说明对进步教育早期一个有组织的实验的报道是适宜的和及时的。

这所学校是家长、教师和教育家们的一个合作的创举，实验于1896年至1903年间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在当时大学联合设置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约翰·杜威的指导下，这个学校产生了一个真诚的愿望，即与儿童共同创造一个教育经验，这个教育经验比甚至最好的现行教育制度所能提供的教育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这个学校是心理和教育系的一个实验室，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就是在这里根据当时新兴的心理学原理，和全系师生、学校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共同创造的。它从来不是一所“实习”学校。

本书题名为《杜威学校》，并不是因为杜威先生作为学校的领导曾经惟我独尊，就像在“一个人的学校”所常见的那样。所以选择这个书名，只是出于对这位巨人的爱戴，正是由于他对每一个儿童和教师的不断增长的能力的客观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信任态度，才使这个学校创办起来。杜威先生从来不惟我独尊。他甚至尊重最年轻的和最缺乏经验的教师的意见，这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发挥创造性。只有一个曾在这样的气氛中工作过的人，才能理解这种

自由对创造性工作的鼓舞。教学工作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社会艺术。杜威先生的哲学，通过他的人格表达出来，又激励别人发挥他们的力量，使所有了解他的观点的人在他的指导下自由地、同心协力地工作。

本书的副题《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表明实验学校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一直是直接的和间接的帮助和支持的源泉。没有专家们的这种指导，教师们在他们日常经验中创造性地行使他们的职责时，可能要走更多弯路。要是这个实验能进行到底，它可能在各年龄阶段的教育方面提出第一个联合事业的范例。

杜威学校逐步发展的课程，无论在教材和方法方面都是许多训练有素的专家们共同实验努力的结果。本书各章将会揭示这个课程的发展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在一切学习领域，非常强调运用有指导的实验方法。主要的假设是：生活本身，特别是为人类的主要需要服务的那些职业和社团应该为儿童的教育提供基本经验。这个实验学校的教室是一些试验的场地，在这里，教师们——各门学科的专家——通过尝试，将会发现足以丰富儿童目前生活的种种特定的经验，使儿童的目前生活成为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和越来越真实的、令人满意的对未来的预备。这个假设就是：在行动中表达的自由，是生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对这种表达的指导，同样是生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儿童期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学习，对教师是一个主要问题，对儿童被看做是一个次要问题，是儿童活动的副产品。学习的最好检验，是儿童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应付新情境的能力不断增长。这种深思熟虑地行动的习惯甚至是社会性的。我们发现，满足和情绪的稳定伴随着学习生活。课程的发展和生长中的儿童的直接兴趣有关，这样，就揭示了他们生命发展这一时期不同心理发展阶段的主要兴趣。一种教育，坚定地保持与这种兴趣的吻合一致，并不断地运用通过行动客观地检验思想和评价这种行动对将来计划的结果的科学原理，这样的教育，对今天动荡的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作者都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凯瑟琳·坎普·梅休，作为副校长，负责发展课程，她也是科学部主任。安娜·坎普·爱德华兹，在实验学校早期是历史教师，后来任特别导师，在高年级参加所有其他各部的工作，这个经验有助于她解释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在当前危机中的价值。

这个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计划，是作者和杜威先生通过周密磋商决定和制定的。杜威先生指导了本书写作的全过程。在磋商过程中，爱德华兹夫人担任秘书，负责保管记录，选辑资料。为了使原稿行文前后一致，显然必须由作者中一人执笔。爱德华兹夫人负责草拟除第十七章以外的各章。她还负责汇集和编辑全部记录和多方来稿。梅休夫人在学校担任数理学科的教学7年，这一经验是第十七章的基础，也是她对本书其他各章所做宝贵贡献的基础，特别是她创造的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即把历史作为人类通过发明、探险和发现不断进步的故事来论述的方法。

本书原稿篇幅太多，不能全部出版。各章都缩减了内容，并从本书正文中删去了两章。

从1896年至1899年，《大学纪事》登载了大量有关实验学校的报道。1900年，实验学校的几篇报告在《初等学校纪事》专刊连载9期。这些报告后来合订成一册，很快脱销。1901年和1902年的记录，包括劳拉·L. 鲁尼恩精心收集和编辑的打字报告和提要。这些报告没有发表过。作者引用的资料来源包括以上提到的各种刊物和文件、杜威夫妇当时的和后来的著作以及学校毕业生和朋友们的作品。艾丽斯·C. 杜威夫人在解决学校很多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学校非常感激。她还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1927年杜威夫人逝世，使她和梅休夫人合著实验学校史的计划无法实现。在杜威夫人逝世以后，本书作者应杜威先生之请，担任了这个工作，借此对杜威夫人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书有很多材料，采自尚未发表过的有关本校的记载。作者还引用了下列各位的文章：乔治亚·F. 培根，奥尔瑟·哈默·巴

丁，莉莲·库什曼·布朗，海蒂·霍佛·哈丁，查尔斯·F. 哈丁，凯瑟琳·安德鲁斯·希利，内利·约翰逊·奥康纳，梅·鲁特·克恩，劳拉·L. 鲁尼恩和凯瑟琳·C. 梅休。应该特别提到乔治·H. 米特夫妇的不懈的支持和他们对实验学校的教育价值的持久的信念。最初有关实验学校的报道，《学校与社会》，这是杜威关于实验学校的三篇讲演，就是由米特夫妇在凯瑟琳·坎普·梅休和奥尔瑟·哈默·巴丁协助下整理出版的。

感谢培根女士、布朗夫人、鲁尼恩女士、萨拉·弗伦奇·米勒、D. P. 麦克密伦和玛丽·图夫对本书早期原稿计划的意见；感谢埃尔西·基拉普有关教师的重要的建议；感谢哈利·O. 克勒特使我们看到一个毕业生为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所收集的函件和资料，以及保存在现在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有关实验学校最后一年的少量记录；感谢乔治·W. 洛克，安娜·布赖恩，格雷斯·富尔默，E. C. 莫尔，弗兰克·H. 曼尼，W. A. 鲍德温和海伦·汤普森·伍利；感谢本校的很多学生、家长、过去的教师、毕业生以及来访人士的衷心支持。感谢马里恩·利·布龙·皮格曼对原稿的最初的修订；感谢伊利莎白·F. 坎普、约翰·L. 蔡尔兹、理查德·H. 爱德华兹、羔伦·M. 弗希尔、小普赖斯·希利夫人和威廉·肯特夫人对原稿所提的宝贵意见。作者还要感谢实验学校的几位朋友和毕业生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几幅照片，使这个实验的故事增添了不少兴趣和价值。

首先应感谢杜威先生专为本书写的许多文章，他同意我们大量地引用他的作品，并慷慨地付出宝贵的时间和思想，感谢伊夫林·杜威（小格兰维尔·史密斯夫人）最后为原稿进行了校订。

（王承绪 译）

新版编者前言^①

1894年，杜威离开密执安大学哲学系，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他可以在芝加哥任职至1904年，他的离开芝加哥，主要由于他对大学当局处理他夫人的实验学校校长职务一事感到不满所引起。杜威和实验学校的关系是他离开芝加哥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原来决定去芝加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杜威急于想把他的较为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形式，他认为他在芝加哥的职务给了他这样做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期，都可以发现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连续进行探索，他讲授“伦理学逻辑”和“教育哲学”课程，并且管理实验学校的实际事务。

杜威认为实验学校本身对理论课程有着一种有机的、功能的关系。正像杜威急于把哲学和心理学紧密结合起来，并使这两门学科和教育的理论研究联系起来那样，他把这所学校看做这些课程的实验室，和理科课程的实验室相似。这种使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努力，也许是杜威整个专业生涯的重要特征。我们从杜威专为本书所写的“芝加哥实验的理论”一文的第一句话，可以了解他全神贯注于这个问题的程度。他说：“教育理论和它的实施之间的差距总是那么巨大，以致对孤立地陈述一些纯粹理论性的原理的价值令人产生怀疑。”

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分析和评价杜威的教育理论本身。他至少写了5部主要的教育理论专著。而且他的抽象哲学大部分间接地和教

^① 1965年美国纽约阿瑟顿出版社重新出版《杜威学校》一书，编者布朗大学阿察姆保尔特教授为新版写了这篇前言。——译者